

《福乐智慧》英译研究

李宁◎著

民族出版社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Kuriadgu Bilig into English: Wisdom of Royal Glory by Robert Dankoff

民族典籍翻译
研究丛书

王宏印◎主编

《福乐智慧》英译研究

李宁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乐智慧》英译研究/李宁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8

(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王宏印主编)

ISBN 978-7-105-11053-7

I. ①福… II. ①李… III. ①福乐智慧—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2835 号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93 千字

印 张:11

定 价:29.00 元

ISBN 978-7-105-11053-7/H·758(汉 23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512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民族典籍，昭彰世界

——朝着中华多民族文化翻译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典籍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在丰富的汉族汉语文化典籍之外，民族文学中的上古神话、英雄史诗、民间传说、小说诗歌，以及戏剧文学等，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和文学画面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这一丰富的遗产，如何继承和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以英语语言文学的博士点为依托，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从事中华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在，我们将这些成果整理成书，系统出版，无疑是一件好事。为此，有必要就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作一基本的交待，以期和学界同仁共勉。

关于中华民族是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融和的事实，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学术认识，是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的基点和起点。这一基本的认识，构成我们相关知识的基本领域和基本观点。中华民族是一个集合性的大民族概念，其中的各民族有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但都共同生活于中华民族的疆域和地理自然环境之内，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由此构成中国多民族长期生活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中国各民族由于长期以来的发展和融和，征战与和亲，也包含了共同反对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和寻求能够共同富裕昌盛之路的努力，在整体上，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完整概念，是无可争议的，是不容置疑的。

按照文化学的理解和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理解，中华各民族都



属于蒙古人种，但在起源和发展中有其不同的民族因素的融合，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值得尊重的特点，不可强求一律。与之相关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化典籍，其中既包括对物质形态的文字描述，也包括精神形态的核心理念，例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正是这些付诸语言文字的有形的精神文化传统，构成我们相互认识和相互交流的重要的认识依据和人文价值，而对于这些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和传播，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文化使命，是责无旁贷的，不可推卸的。

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情况来看，构成民族文化典籍的东西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充满着智慧和多元文化价值的。例如，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的原始先民的神话系统以及其中反映的原始先民心理的原型，稍后在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英雄史诗以及所体现的民族大义和英雄精神，构成一种活态的表演性的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文学艺术形式。此外，大量的作为精神文化的行为化作品的舞蹈和音乐作品，也是一笔十分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适合纯粹的音乐的，而大部分则是有文字为载体的可以翻译的歌词和诗词作品，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和开拓的研究领域和翻译项目。

关于民族文学的研究，大体说来，可以有如下一些基本的思路和选题范围：

1. 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和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搜集资料，探求线索，就民族文学和文化典籍作文本和版本的实证研究和考据研究，促进新资料的发现和发掘，或者针对新近发现的民族文学资料，做进一步的版本与文本的考据研究，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寻求丰富和加深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和掌握的途径。

2. 引入新的语言学的研究机制，针对新的资料的发现和发掘，作详细的文本研究和意义的分析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可以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也可以用传统的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注释和疏解性

的研究，旨在探究这些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且进一步作社会历史渊源与文化学艺术学的解释和说明，以丰富和加深对于这些文献的理解和掌握。

3. 引入翻译学和译介学研究方法，对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翻译文本的对照研究，接受和传播研究，这里首先包括民族文本向其他民族文本的翻译，向汉语的翻译以及向外语的翻译研究。当然，反向的翻译研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一个民族地区如何翻译外国语言文学、汉族语言文学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学成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翻译文学纳入本民族的文学史。不过，在目前的研究题目里，我们从事的主要是以民族文学的外译和汉译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其他方向的翻译研究，也有待于学界更多的关注。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研究课题的基本思路，我们将逐渐推出南开大学中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在博士生学位论文基础上的改写和完善项目，作为研究的专著予以出版发行。在研究范围上覆盖了大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的典籍翻译，在民族上则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彝族等的典籍翻译研究，在文类上包括了史传文学、英雄史诗、叙事诗和抒情诗等较为广泛的体裁。虽然我们的研究是初步的，题目是有限的，但我们希望这样一批研究成果，会在某种意义起到开拓和先行的作用，对国内外的民族文学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为中国当前的翻译学学科建设贡献自己一份独特的力量。

诚恳地欢迎学界同仁的批评与指导，欢迎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
愿朋友们携手并进为建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翻译格局而努力！

王宏印

2010年5月1日

南开大学寓所

福乐文化 智慧人生

——序李宁《福乐智慧》英译研究

春季前夕，李宁要回新疆探亲和办喜事，临行前寄来她的博士论文的修改稿《〈福乐智慧〉英译研究》，已联系好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要我作序。我没有什么理由推辞，因为这原是计划中的事情。年前读了一遍稿子，发觉修改的地方不少，可是毕业已经两年，题目于我有些生疏，一时理不出头绪，就搁了下来。不觉年关已过，归期在望，开学在即，只好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好在是一个吉祥如意的题目，不必搞得太学术，就动起笔来，写了如下的文字。

李宁是我从新疆大学应届硕士生中招来南开大学读博的，在我的指导下从事《福乐智慧》的翻译研究，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研究，已取得了决定性的研究成果，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在李宁上学的几年中，以及在毕业后的这些时间里，每当有电话联系和当面交谈，或收到她从新疆寄来的特产，新疆那片神奇的土地都会牵动我的西北情结，给我生活的新奇与探索的向往。回想起十多年前的一次新疆之行，那是从西安到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次收获颇丰的讲课和旅行，到伊犁边疆的美好记忆：在那遥远的地方，仰卧在天山山坡的阳光下，下面有河流蜿蜒，牛羊点缀于草地，上空有苍鹰盘旋，白云悠然，那一份深厚，一份高远，一直延续至今，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不久前，我在写给新疆大学外语学院谢旭升教授的《特色汉英翻译教材》的序言里，曾这样描述了新疆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和人文及翻译研究的意义：

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广大，文化之广漠。在历史上，新疆曾是西域丝绸之路的故乡，佛法西来的必由之路。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说法，她汇聚了具有不同文化渊源的四种文化，是翻译产生、发展和研究的天然沃土，也是掌握了23种语言以考察稀有碑志为特长、志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陈寅恪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外，新疆还是天生的翻译家族锡伯族诞生和活动的场所。所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新疆都是翻译的故乡，在世界翻译地理学中本应占有“底地国家”一样的翻译圣地的地位的。正是由于这一层考虑，我曾经梦想，在新疆，例如新疆大学，一定要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中心，从事和民族翻译与对外交流有关的翻译活动，才不负这一片神奇的地方——欲与博格达雪峰一样的巍峨，像天池一样的绚丽多姿的，本也应属于那奇妙的翻译之境。

正是基于对新疆这个地方的一种理解，我让李宁负责调研一下新疆地区的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情况，而李宁在经过了较为广泛的探索之后，选定了《福乐智慧》这样一个维吾尔族的文化典籍，研究它的文化传播特别是英语翻译的情况。如今，这样一项研究的成果已经摆在我的面前，而且将以专著的形式正式出版问世，我怎么能不为之高兴和激动呢？伴随着学生的专门研究，几年来在这个领域我也有了一些间接的接触和初步的思考，积累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以下是关于《福乐智慧》翻译研究与相关的学术研究的探讨性意见，兹书写下来，权作一篇序言。

首先，要讲的一点，就是关于李宁《〈福乐智慧〉英译研究》所做的工作和已经取得的成就，需要一个大概的估计和评价。我相信，具体的内容只有读者自己去发现和认识，而这里的几点只是一些概要的总结：

1. 这一选题本身是一件大事，对于维吾尔族的典籍翻译研究，可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把《福乐智慧》视为该民族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文化典籍的话。尤其是关于这部作品的英译和对外传播的研究，可以说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2. 李宁的研究内容，包含了这一维吾尔族巨著的文化的定位和文学的分析，考察了原书版本和英译本的关系，尤其在宗教和哲学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文化方面，主要集中讨论了与民俗有关的问题，而文学方面，则重点探讨了柔巴依诗体翻译的问题，包括散体和诗体等翻译问题。

3. 关于典籍翻译的理论探讨，在涉及译本评价和翻译策略研究的时候，李宁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提出“双向构建”的问题，值得重视。其要点有四：

(1) 译者的文化立场：即对于原作文化和译作文化，应持有同样的尊重态度；

(2) 翻译的构建策略：即利用两种文化与语言作为翻译再创造的资源，进行富于创造性的翻译工作；

(3) 翻译构建的方式：是温和的而不是激进的，灵活的而不是刻板的，以文化交流为目的而不是以控制和干涉为目的，体现和而不同的容忍和包容精神；

(4) 作为翻译成果的体现：是建立超越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第三空间，即适当离开原作向理想的译作的方向迈进，保留和牺牲一定的异质成分以便追求文化间更为顺畅的交流。

我以为，这几条原则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典籍翻译，乃至更为普遍的文化翻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作为导师能够为学

生的研究成就感觉到自豪的。

以下转入本人就《福乐智慧》及其翻译研究的几点认识：

一、《福乐智慧》的多维研究课题

《福乐智慧》是 11 世纪我国境内的维吾尔族诗人、学者、社会活动家优素甫创作的一首长诗，多达 13000 余行，于 1069—1070 年完成于喀喇汗王朝的又一政治文化中心喀什噶尔，献给喀喇汗王朝君主阿布阿里哈桑，受到后者的赞赏，遂授予优素甫“御前侍臣”称号。这部不朽的著作融合了众多的文化资源与人类智慧，通过四个人物的对话寄托了深刻的道德寓意，阐明了安邦治国之道和教化人民的意义，具有永久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关于这一重大的文化课题的研究，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现简要陈述之：

1. 作者研究

作者研究是文学艺术类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人文学科的要点就在于围绕人这个主体去作研究，从生平经历和所受影响来推测作者之思想和作品的表现，再用这种作者研究去解释作品中的东西，一般倾向于同一和统一的说法，但也有分期和变异的问题。从《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甫的情况来看，其所生活的年代比较确定，基本生平和创作时间可以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在《福乐智慧》作品的散文体和诗体序言中，以及附篇和正文的某些部分，都可以找到关于作者自己的介绍和说明，涉及他的生平、创作与心理的描写。这种情况，和《红楼梦》里的作者扑朔迷离的隐现一样，既需要从文本本身寻找线索（其中的溢美之词甚多），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其他相关作品和历史资料中作进一步研究。可以说，关于作者知道多少，关于作品就能知道多少。好在和《红楼梦》作者的复杂情况相比，学界对于《福乐智慧》的作者本身没有异议，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在文字之外的新的资料，例如在出土文物资料的发现方面，也许很难有重大突破，需要在相关资料的相互关联上下功夫，

例如在作者思想和生活的渊源上下功夫，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破。无论如何，《福乐智慧》的作者，和那些根本无从确定具体作者的文化典籍的情况相比，已经是得天独厚和有根有据的了。

2. 文本研究

文本研究包括版本研究，和文本本身内容与形式的研究，以及互文性资料及影响力的研究等课题。在《福乐智慧》中，原始文本的丧失，三个抄本的发现以及汇集校刊本的完成，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本子之间的联系和改变与沿革关系，要能做到了如指掌，最好是能绘制一个谱系，让其中的关系一目了然。这是此类研究的基本功。对于原始文本系统没有十分清晰的掌握和仔细的了解，就没有翻译研究的基础。翻译文本系统的研究是文本研究在翻译领域里的重中之重，但需要以原本系统的研究为开端和基础。

在理论上，《福乐智慧》的文本研究，不同于《蒙古秘史》的文本研究。后者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原本何以会丧失，以及如何进行“古本复原”的问题。而《福乐智慧》的版本研究的情况更是十分复杂。例如，为何在校勘本完成以后还有这么多相互转译的翻译作品，而不是直接从校勘本翻译而来？为何翻译本子的大量出现，会集中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为何存在着同时向土耳其语的翻译和非土耳其语的翻译两个大的翻译方向？在中国当下的翻译活动中，现代汉语本的地位如何？如何评价？等等。

3. 文化研究

季羨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福乐智慧》写作和流传的主要区域在新疆，诚如季羨林先生所言，而且其作品本身也包含了这四种文化的元素。首先是希腊哲学元素，例如，公正和运气的比喻，但有可能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种



灵崇拜和阿拉伯或波斯译文而来，而且诸如知识与才智的区分也带有希腊哲学的味道，但也可能作为价值观在世界其他哲学中会普遍存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体现为佛教教义的传播，这不仅是因为佛教经西域传到东土，苦行主义在《福乐智慧》中多有体现，而且体现在觉醒与贤明的辩论中。《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价值观在《福乐智慧》中显而易见，其中一些格言可能直接取自伊斯兰教经典，而且贯穿于整个作品的始终，但也不必过分强调它，因为作者的思想来源十分广泛，而其主要读者则突厥语方向的，这就使得伊朗-伊斯兰文化需要有一个新的归宿和整合倾向。

至于中原文化的影响和同化作用，主要体现为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和渗透作用。不过，中原文化的影响有一个渐进的渗透过程，对儒家文化的强调，正和西方学者对于希腊思想的强调一样，不仅构成二者相互平衡的机制，而且在平衡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影响方面，也构成另一重景象。其全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思想来源丰富而驳杂的文学作品中，不仅是宗教和哲学在起作用，而且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化和生活态度也在起作用，在政治伦理与法律之间，在出世和入世、来世与现世之间，在劝导帝王的王道统治与风化和一般老百姓的道德之间，作品能够达到平衡与协调的机制，肯定是多元互补的而且是协调划一的。因为这是一部成熟而完整的经典作品，而不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但也不必过分强调其中的统一性，因为任何结合与融合的程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矛盾性是普遍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和作品之中的。只要按照作者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可以取得一个基本的融合状态，就是比较理想的了。

4. 译者研究

在没有真正进入译者研究的翻译认识中，特别是在一般的教科书上，译者被定义为需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语言能力，翻译水平和相关知识的人们。但是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究竟起着什么

样的作用和如何起作用，却没有得到实际的有价值的研究，甚至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在国内，对译者地位的重视，虽然后来有了叫作主体性的理论，但它为德国哲学解释学的先见论决定论所独断，根本就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进展，同时由于中国历来强调精神作用的唯意志论或绝对自由论的死灰复燃，又将译者说得神乎其神，云里雾里了。再后来，由于进入到后现代的主体间性的讨论，主体泛化，概念混淆，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掩盖了译者问题的研究。

译者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什么？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难道首先不是能够通过译者的研究来说明和解释其翻译作品吗？但是实际上，很多译者研究却不是这样，而是生平资料的堆积和翻译上的评功摆好，或者在最终的归宿和结论上语焉不详。时代背景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必须纳入到对于个人的影响才有意义。这里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作为对于译者的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只有转换为自觉的执行或拒斥才能看出它的作用。另一方面，译者本人的思想意识，以及潜藏于语言文化中的思想性积淀，都会自然地发生作用。诗学的问题也是一样，其艺术修养和诗学主张，转移到翻译领域，就成了译者的具体策略。当然，其他如操作和执行状态的赞助者，也都可以归入到译者的研究中才有意义。

就《福乐智慧》的众多译者而言，国别国籍、宗教信仰、语言状态、翻译目的、读者对象，都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还有在一种文化里和文学创作十分相似的翻译习惯和写作笔法，它转换到翻译笔法里，就会起关键的作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条假设：不同文化中的译者，是此种文化以及众多相关文化力量影响的综合体和承载者与执行者。他们肯定具有完全不同的翻译理念、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而不是只有直译、意译、归化、异化一类概念上的东西。对于像《福乐智慧》这样有十几个译本和来自数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语言翻译的译者，其研究会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状况，甚至可能有惊人的发现——只要是真正进入到这些译者的内外环境和翻译世



界里而不是浮在文字或文化的表面上。

5. 文学研究

这里所说的文学性是广义的，并不是要把《福乐智慧》仅仅定义为文学作品，而不顾它的宗教性质和政治教化功能。恰恰相反，我们是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来确定它的文学性的。这种文学性，也即包含了一定的文献性，即广义的 literature。相关的研究包括：神话原型批评的研究，叙事学和人物塑造的研究，哲学宗教与思想主题的研究，修辞学意义上的写作方法的研究，作品的语言研究，诗体与散文体的翻译研究，以及诗学与教化功能的研究等等。所以，这里的文学研究，不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性或艺术性研究，也不是所谓的脱离开思想内容的创作技法研究。它的要点是要为翻译研究提供基础和内容，而不是泛泛之论，或者局限于对于文学作品的一般化的认识。

以下提供一个《福乐智慧》的故事梗概和人物关系，这样就会把《福乐智慧》当作一部具有叙事性质的文学作品，所以重要的是要思考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寓意：

国王日出励精图治，一心求贤。月圆慕名而来求见，以图报效国家，深得国王信任，出任大臣多年。月圆辞世时向日出托付其幼子贤明，贤明得国王恩遇而承袭父职。贤明有一宗亲名曰觉醒，人品高洁，日出王欲召其出仕，与贤明共为辅弼。然而，此人奉行遁世主义，潜隐山林苦修，虽经贤明奉旨三此敦请，始终不肯应诏出仕。时光流逝，贤明亦产生了遁世苦修之念，觉醒却劝其忠心报效日出国王。不久，觉醒疾，卧床不起，贤明前来探视。觉醒死后日出王和贤明深感悲戚，对高洁人品缅怀不已。此后，贤明秉政益加勤勉，天下遂乃大治，云云。（《福乐智慧》，郝关中等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第5页）

6. 传播研究

这里的传播研究自然指的是和翻译接受相关的传播研究。它可能包含不同的问题，例如较为微观的问题，接受方的主体文化对于翻译内容与形式的需求，翻译中的译者对于这种需求的了解和认识，以及不同层次或类型的读者如何接受或拒斥这种译文，哪些是译文质量本身的问题所导致的接受困难，哪些是社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等等。还有较为宏观的问题，例如，一个作品在世界各地的传播的地域分布情况（翻译地理学与环境学），传播的趋势以及可能发生的转向，传播的时间区段、高潮低潮，主要的深层的原因以及人们的认识偏向与评价的价值取向等。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里，跨文化交际（或传通）是一个必要的专业基础，但是一般所谓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充其量只能是参考性思想和原则性的提法，而根本的问题是要能够深入到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的语境和过程中去，获得准确的资料和可靠的知识。社会心理学也是一个必要的认识角度的参照，但也是要和民族学、民族关系史等问题联系到一起，才能取得准确的民族心理的描述和社会文化的依据。其他有关的方方面面都是值得考虑的，兹不一一列出。

7. 语言研究

翻译中的语言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研究侧重，由此构成不同于一般语言学意义的研究。例如，在现有语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意义的语言比较或对比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可以涉及《福乐智慧》文本所包含的各种语言，也可以涉及翻译所涉及的不同的语言。前者是文本融合性质的，重在说明一种文本何以会有这么多语言来源，和这些语言是如何融合在一个文本之内的。后者则涉及不同的翻译语言之间可能触及的翻译问题，例如语言之间的相似性的问题，以及转换难易程度的问题，当然，所谓的翻译难度是相比较而言的，包括在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之间，以及这些语系内部各语言之间的转换的难易程度问题。在这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翻译研究

人员和语言学家对于世界各国语言和语种掌握的限制，以及二者之间的某种隔离状况，如此的宏观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缺口和发展余地。

翻译研究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断言是由于语言的问题而使得译文和原文产生差异的，在何种情况下则不是语言问题，而是其他问题，例如译者个人水平的问题或者翻译策略与方法高低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不熟悉甚至不精通文本所涉各种语言的特点，常态与变异状态，而且不能估计其在翻译中的具体情况并根据其中的变化条件做出判断，就会导致对翻译基本问题的判断失误，或者将该解决的问题转移到其他不能解决的领域，做出文不对题的或不负责任的说明。因此可以说，归根结底，翻译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问题。就民族典籍的翻译而言，目前亟待一批掌握一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专家。

8. 批评研究

批评研究自然包含对《福乐智慧》原本的批评，和各个译本的批评。这两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在于原本的批评相当于一般的文学批评，虽然文学也可以有不同的侧重，例如文本批评、文化批评，以及更加侧重于影响的诗学或意识形态批评，和接受与反应的研究批评。而翻译的译本批评却是针对译本而发的，涉及文本质量的评价、译文策略和技能的部分，以及联系到译者和社会文化因素的批评意见。但是另一方面，若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即把二者看做是一个连续体，就会产生原本批评与译本批评的因果关系和影响关系，或原作效果与译作效果的关系问题。不过两个文本之间也有彼此可以平行比较的可能性，依据比较也可以得出一些批评性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固然是评论性的，但未必总是评价性的，在很多时候，批评也可以采取非价值判断的形式或姿态。在非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可能是批评者超脱文化立场所采用的非本位立场，而价值判断的观点，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和批评者本人的文化

立场和身份密切相关。在《福乐智慧》这样牵扯众多文化因素的翻译批评中，甚至在只涉及原作的文学批评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境都会起作用。而这些作用，归根结底，既涉及对于翻译的性质与功能的理解，又可以受到翻译本身的影响而采用不同的观点对待之。

9. 理论研究

概括说来，《福乐智慧》的理论研究应当包括以上各个方面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但是这样说过于笼统。往高地说，可以说不直接研究这个作品而是研究由此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仔细地说，可以分为不同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文化融合理论研究、翻译与传播理论研究、语言学理论研究等等。例如，这部作品究竟如何为文化融合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问题和资料，值得重视。一般所谓的文化传播理论有波状理论和谱系理论，但这两种理论都不能有效地说明其中更为复杂的文化问题。例如，我们既不能准确地为当时的突厥—伊斯兰王朝做出文化谱系图，也不能说明其中的传播是由那些中心向边沿的渗透，因为这个王国当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是各种文化荟萃与发挥作用的集合地带。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流行的后殖民理论当然也不能说明其中的复杂情况。因此，需要我们根据具体作品的研究从中发现或梳理出新的理论来。

又如翻译传播理论研究。按照一般译介学的观点，把现有的译作作为现成的结果接受下来，按照一种或一些西方理论寻找一些线索说明它们的有效性，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有问题的。按照传统的翻译理论，只在文本转换上下功夫，把技巧和文本对照作为法宝，也是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这里所谓的翻译传播研究，就是既要说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也要说明不同来源的思想和文化如何借助文学作品的翻译取得了某种妥协和融合，而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可以接受的传播效果，哪些方面则不是，或者有待于改进，从而对不同的翻译行为和结果做出评论和评价。但这还不够，还要尽力